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

王小刚<sup>1,2</sup>

(1.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镇江 212003; 2.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转,都是需要信用的,在社会化大分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信用的要求就更高。可以说,信用造就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资源是十分贫乏的,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瓶颈。要摆脱这一困境,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同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

**[关键词]** 市场经济;信用;基础;传统文化;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 F045. 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2009)05 - 0013 - 08

## 一、信用造就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

很多人对市场经济有一种误解。认为市场经济以人的自私为前提,因此对于人们道德水准的要求要比计划经济低。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其实市场经济对于人们道德水准的要求比计划经济要高。因为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都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其社会运转的动力主要来自上级的计划命令,因此是一种要求更多他律的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而人民毫无自由的制度。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散决策的制度,其实质是给予了每个人更多的选择以及更多的自由权利。康德说过:“自由即自律。因此市场经济在给予每个人更多自由的同时,其实也要求人们要有更多的自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自律就是要讲信用。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乃是一个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信用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而产生的。最初的商品交换盛行的是实物交易,货币的介入使交易较之物物交换容易达成。但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方式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经常发生困难。比如购买者可能由于

自己的商品尚未卖出,因而无钱购买别人出售的商品。于是,赊销即延期支付的方式应运而生。赊销意味着卖方对买方未来付款承诺的信任,这样买卖双方除了商品交换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即信用关系。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现代社会通行的纸币,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现代金融业就是信用关系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和社会分工。

现代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发展过程是信用交易范围的扩大,如果说在一个较小社区范围内的信用交易,由于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还可以用亲情关系、邻里关系来支持,那么发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乃至全球市场上的现代信用交易,就必须要有切实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因此,普遍的守信行为是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的前提,也是每一个企业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

\* [收稿日期] 2009 - 05 - 27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技术跨越的江苏高技术企业战略环境分析”(06SJ630011)

[作者简介] 王小刚(1976 - ),男,安徽巢湖人,讲师,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事实上,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信用基础。因为交换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性,而交换实质是种信任关系。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交易后果的一种保证,任何事实上的交易都必须有潜在的信用提供者。现代市场活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实质乃是信用的扩展。没有信用,现代大规模的、复杂的市场活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运转链条中,无论是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信用。没有这种信用,就没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如果没有信用,就只能在熟人之间进行交换,交换无法超越小小的村镇。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在一个经济中,信用经济成分的大小,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力。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做了精辟地论述:首先,信用促成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这是因为信用有助于资本的转移,可以使资本比较容易进入利润率高的生产部门,这样就加速了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第二、信用可以节省流通时间。“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sup>[1]</sup>。通过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借助于汇票、股票等虚拟资本形式的信用工具,完成了商品交换时间的过渡,加速了商品流通和资本循环,节省了资本的流通时间。第三、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有了银行信用,“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sup>[2]</sup>。信用又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从而节约了货币。第四、信用加速了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由于“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sup>[3]</sup>可见,股份公司的建立离不开信用制度,而股票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凭证。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惊人的扩大。“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筑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sup>[4]</sup>

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如果信用缺失,也会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会“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sup>[5]</sup>。“从而导致最大

规模的剥夺。……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sup>[6]</sup>所以如果信用缺失,就会把资本主义变成一种赌博欺诈的机器,而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那么“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1、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sup>[1]</sup>

所以要使得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充分发挥,要有信用。信用虽赖法治维持,但法治也可以视为一种信用,一种对于社会契约的信用。可以这样说,信用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信用造就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所以不能自发的,内生的发展出资本主义,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缺少信用这个最基本的要素。

## 二、传统中国社会信用资源的贫乏

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讲信用的,比如儒家经典有礼义仁智信的说法,但是即便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信是被排在最后一位的道德品质。而且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非常不好的“避讳”观念。《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而编纂的一部历史书。据《春秋·穀梁传》记载,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一个原则,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也就是说要为伟大的人隐瞒丑事,要为高尚的人隐瞒过错,要为自己的亲属隐瞒错误。可想而知,按这种原则编写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往往就脸谱化,就把坏人说得什么都坏,好人说得什么都好。熟读中国古书的毛泽东感叹:“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sup>[2]</sup>至今,中国人为了维护所谓国家的形象、领导人的形象而隐瞒了许多真实的历史。这样做,使得后代人不知前代人的历史,因而

一再的犯同样的错误,使我们这个民族吃尽了苦头。真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慎之先生说过: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儒家伦理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其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政治是按照法家思想来设计和运作的。但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和法家霸道思想却是针锋相对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的巨大矛盾。中国在这种“外儒内法”的政治框架下,形成整个社会虚伪欺诈、没有诚信的强大的政治基础。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sup>[3]</sup>这种“表”与“里”完全相反的差异特点,长期以来塑造了中国国民的双重人格,造就了无数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特点:“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

由于不知道其他社会的情形,很多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缺少信用这一点往往并不自知,而很多在中国社会生活多年的外国人却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察。比如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有生动的描述:“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天生虚伪。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同别的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这又是猜疑的例证。”“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

尽管有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还是很有商业信用的。但史密斯还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与拉班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语所言:铜盆撞与铁扫帚。有一句俗话说: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殊难避免。甚至于很大的商号,贴出‘货真价实’、‘绝无二价’

的告示,却也名不副实。史密斯的评叙直率而尖锐,真诚而深刻。或许对此颇有同感吧,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鲁迅曾经郑重向国民推荐这本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经济,人们附着在土地上,聚集成一个又一个的村落。由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因而每个村落形成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而支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又特别重视血缘关系。因此传统中国的诚信格局是“差序格局”,即以我为中心,由亲向疏扩展的,类似于一个不断扩散的同心圆。这就使传统的特殊主义的诚信原则和诚信格局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中表现出高度的不适应,正像马克斯·韦伯说的:“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于是,迫切需要普遍主义的诚信原则,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关系。

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信用资源是十分贫乏的,所以很多人感叹今不如古、世风日下,试图依靠传统文化的资源来建立诚信,无疑是找错了药方。其实我们的整个文化告诉我们,你不能诚实,你诚实了就要倒霉。比如华盛顿砍了棵樱桃树,他爸爸问谁砍的,他说我砍的。他爸爸不仅原谅了他,还夸奖了他。但是他爸爸如果把他责备一番,甚至还要打一顿呢。他以后还会老实说吗!但是中国的家长基本上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有病。没有诚信观念,以权谋欺诈为能事是我们传统文化非常大的一个缺陷,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最致命的缺陷。正如史密斯所言:“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相互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sup>[1]</sup>

### 三、当代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腐败”,而最关心的道德话题就是“诚信”。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诚信的社会,到处弄虚作假,造成人人自危,在葬送一个民族的未来。比如说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假烟、假酒、冒牌商标,发展到毒米、毒油、毒茶、毒火腿,早已越过了“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这个古老的禁忌。

在安徽阜阳农村,自 2003 年以来 100 多名婴儿陆续患上了一种怪病,而令人意外的是,导致这些婴儿身患重病的竟然是他们每天都必须食用的

奶粉。长期食用这种劣质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被称为“大头娃娃病”。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表明缺乏诚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道德危机。

会计师本是靠诚信吃饭。因为真实的数据是商业、金融、经济决策的根本依靠。没有诚信的数据将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会计师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现在,“会不会造假账”反而是衡量一个会计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指标。一系列的财务丑闻暴露出本应以诚信立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经堕落成了造假的骗子。例如,郑百文是一家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的公司,但经过企业的包装和中介机构的“审计”,居然变成了一家所谓的10年时间销售收入增长45倍、利润增长36倍、上市当年实现销售收入41亿元的“名牌企业”,最终给投资人带来重大经济损失。银广夏本来是一个早已资不抵债的空壳公司,却让会计师计算出有7.45亿元的年利润。

中国股市更是徇私舞弊的深渊,各种黑幕触目惊心。不少国有企业上市就是为了筹资圈钱,既没有转变经营机制,也没有改善经营管理。无论是否赚取利润,也很少分红,回报股东。不少上市公司和券商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大股东”或“庄家”合谋造市,“违规”炒作,哄抬股价,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股市违规之风盛行,“违规”行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就指出中国的股市是一个连赌场也不如的所在,现在已经完全沦为少数权贵欺榨广大股民钱财的工具。

企业逃废悬空银行债务屡见不鲜。许多企业利用改制之机。通过不规范的破产、分立、兼并、合并、承包、租赁、拍卖出售等方式逃废银行债务,有的企业还利用多头开户、坐支现金等方式逃避银行监督,拒还银行贷款,严重损害了银行债权人的利益;甚至有些企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继续拖欠金融机构贷款。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截至2002年底,仅北京市建筑行业就拖欠民工工资达30亿元,引发和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学术这个原本圣洁的殿堂在信用缺失的冲击下,也产生了许多信用缺失的不端行为。人类学领域的权威学者王某某剽窃他人著作事件,“基因皇后”陈某某涉及的“基因库”事件,用美国进口的芯

片冒充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事件。据目前揭露的学术造假案例来看,涉及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和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其他的诸如买卖书号、徇私关照、项目垄断、虚假鉴定等等虚伪现象等,这使人们对教育界、学术界的科学良知和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公正性颇为忧虑。

“杀熟”现象令人瞠目结舌。所谓“杀熟”就是欺骗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中国人虽然诚信意识不强,但一般有一个底线,都是骗与自己没有感情的陌生人。但是当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杀熟”的一个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破坏殆尽。对于受害者来说,伤害是巨大的,会产生怀疑所有人的想法。如果有这种经历的人越来越多,因而这种想法蔓延开来,从个人意识逐渐变为社会意识,就会造成一种“谁也不可信”的社会氛围,更会形成“老实人吃亏”的局面。这将是十分可怕的。诚信问题影响的却不只是现在。目前,中国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占总人口的28%。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讲诚信的环境中,对他们自己、对民族的未来,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大量事实说明,由于缺乏诚信给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全国每年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目前银行告企业欠账胜诉率虽在95%以上,执行率却只有15%,银行由于逃废债务承受的直接损失每年约1800亿元。三角债也非常严重,目前全国约有1.5万亿元,很多企业被迫采用现款支付,因此增加的财务费用1年有2000亿元左右。<sup>[1]</sup>这次奶制品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对中国的食品业是一次毁灭性打击。中国内地出产的食品在国际市场上遭到了进一步的抵制,连很多海外华人在购买中式食品时,都尽量买香港、台湾生产的,而不买大陆生产的。汪丁丁说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分工合作,没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或血缘关系的支撑范围以外的。”

如今中国有个怪现象,那就是面对各种批评,一些人采取了一套“向坏看齐”的策略。你批评中国有黑心食品有毒食品吗,他就说外国也有,至少是过去也有过。这种解释无聊又可耻。本来我们是应该向好看齐的,怎么能向坏看齐呢?更何况这些人所讲到的外国的问题基本上不符合事实。也有一些人把问题归结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唯利是图的品性。其实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诚信,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使问题更加突出而已。

总有人爱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时不时还发出超英赶美的呓语。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弄我们。其实,以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文化基础,不可能也不应该主导世界的格局。正如柏杨所说:“这是我们文化中虚妄的一面。我愿意很肯定地说,21世纪甚至于22世纪也不会是中国的世纪,而且绝对不可能。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这么大的自然科学的生产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运营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道德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文化能力,不可能。……假定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就是改变了,那说谎就成了美德,是不是?”<sup>[2]</sup>所以我们应当要正视自己的缺点,要有反省能力,而不是自欺自欺。

#### 四、中国如何摆脱信用危机

##### 1.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仕途命运主要掌握在其上级领导手中。因此中国的党政机关尽管网罗了中国社会最优秀的人才,但是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心灵都变得扭曲。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风气弥漫着官场。由于法治没有确立,在这种人治的体系之下,政府的决策没有透明性、公开性。相反,公共政策的制定充满了随意性、神秘性,暗箱操作、潜规则盛行。就像坊间一句流行的顺口溜所揭示的: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条),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这些做法使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失去公信力,加剧了整个社会信用的流失。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权力过大,管制行为过多,而且出台的一些“土政策”,朝令夕改,易使政府失信于民。

正如史密斯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所指出的:“整个统治阶级,不是这个帝国最优秀的,反而

是最糟糕的。”“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巧得当。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算实施。所有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员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示范效用,这使得官场的不良风气扩散到整个社会。正如柏杨所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而这政治文化的内容是顶着一个君,顶着一个‘神’,所以它又是一个官僚文化。这官僚文化说起来就是一个马屁文化,就是屈服文化,就是奴隶文化。”<sup>[1]</sup>所谓的“官僚文化”,就是好讲面子,讲排场,讲假话,办假事,虚张声势,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只要面子上过得去,不管面子下多么卑鄙、肮脏、下流、无耻。

马克思曾谈到:“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sup>[2]</sup>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sup>[3]</sup>所以要改变党政机关的这种“官僚文化”及其对社会信用的腐蚀,很显然必须要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 2 确保言论的自由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统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实行愚民政策,特别强调思想的一律,严格控制不利于统治者的思想和言论。顾准曾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也就是以政治权威为思考中心,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文化。而与政治无关的东西就没有出路,登不上台面。这与西方自古希腊形成的多元、竞争的文化传统大相径庭。这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陷入长期停滞的一个根本原因。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文明论概略》中他谈到,在吸取西方文明方面,中国比日本要困难许多,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权威同时也是思想的权威,没有言论的自由,而统治阶层又是如此的平庸保守,所以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就很难提高,社会进步就很困难。所以即使有一百个热心于“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也是无济于事。而

日本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却有言论自由的空间。

所以缺少言论自由,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的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也使得中国人习惯于说假话、大话、空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教训。中国自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对于敢于直言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弄的中华大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以至于到后来的“大跃进”运动疯狂发动,全国上下都在大张旗鼓的谎报产量、说假话时,已经没有人敢说一句真话了。最后以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惨剧草草收场。“文革”期间,对领导人物的歌颂、吹捧已经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社会常识,更是达到了肉麻荒唐、离谱出奇的地步。而对于领导人物的稍微不敬,就会有杀身大祸。这样的社会可想而知会落后到什么程度,以至“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近崩溃边缘。

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的程度较之“文革”时代,虽然有显著的进步,但是仍然有诸多的限制。在一些地方,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学者和官员,仍然会受到不公正待遇。即便在学术领域,也有许多禁区和敏感话题。许多可以说是常识性普适性的东西,一些人还在争论不休,把水搅浑,更不用说在实践层面中加以贯彻了。而我们一直所诟病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他们有真正的言论自由,非但不限制,相反还在鼓励批判。资本主义确实有一大堆罪恶,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能逐步走向文明。比如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的“进步运动”,新闻媒体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批判就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言论自由的重要意义可能超过我们通常对它的理解。

### 3. 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有贫富的分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贫富的差距一定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一般基尼系数在 0.40 以下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贫富差距下,从宏观上来说,可以保证相当水平的内需,国家的宏观调控只需要起辅助性的作用,而不会摧垮市场经济的基础。从微观上来说,财富集中程度可以保证大规模私营企业的出现,也可以保证整个社会的财富形成一定梯度,构成社会流动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结构大致为橄榄形,可以保持稳定。

但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远远超出合理限度,无论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来看,都会给中国

的未来造成极大麻烦。而更让人不可接受的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是以腐败和垄断为基础的,是以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被损害、被侮辱、被践踏的基础之上的。当一些人终日辛勤劳动而两手空空的同时,另一些人贪赃枉法而腰缠万贯。当一些人生活贫苦度日如年时,另一些人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这种世态炎凉的社会图景对人们心理上的伤害是巨大的。

在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过大的贫富差距必然会使一部分人濒临于生存的边缘。而中国目前的富人很多发的是不义之财,这使得社会的一些贫困阶层被剥夺感强烈,对社会充满仇恨报复心理,从而丧失道德底线,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造假行为。所以制假贩假固然让人深恶痛绝,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所以贫富差距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关乎社会道德、人际信任的建立。

### 4.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西方国家都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比如在美国,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行为,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到麻烦。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我们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明晰产权。信用关系是产权关系的延伸,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明晰的产权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基础。明晰了产权,人们才有稳定的预期和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因为产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重复博弈的机制,只有讲信用、积信誉,才能保证长远利益的实现。其次是完善信用法律体系。有了明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一定会讲信用,只要失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人们就可能不讲信用。必须要用完备的法律防范和惩治产权主体的不正当行为,以维护和保障社会信用。不过要使纸面上的法律真正发挥作用,我们还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法院、检察院应当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而不应当归中央政法委辖制,从而确保司法部门能够独立有效的行使职能。

最后要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我们应建立独立、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应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依靠专业技术、规范管理和配套制度、法规来保证其信用评估的客观性,它不应该受到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被评级对象的干预。我们应把国外经过多年探索而形成的一整套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行之有效的评估办法吸收过来,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消化,形成科学合理的评级体系。信用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将分散的个人、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包括资产信用状况、纳税信用和守法信用程度等,在统一的原则下集中到信用评估机构,形成较完整的个人、企业信用档案,以做出整体评价,并面向特定对象提供资信服务。

### 5. 树立人生的信仰

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信仰真空。尽管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有很大提高,但是在精神生活上却十分的失落。传统上对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很难凝聚人们的共识,甚至遭人奚落,现在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一种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权力、金钱和美女成为人们新的信仰,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迫切要树立人们新的更为崇高的信仰,必须要重视和发挥宗教的功能。列宁曾经断言:宗教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但在经济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于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首先是心理功能。很多人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与压抑,需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求得慰藉,而科学和财富对这些却无能为力。著名学者余英时指出:“中国人相信科学,相信科学主义。像五四那一代,科学口号非常高,认为宗教只是迷信,包括很有见解的人,像蔡元培都说要用美学艺术代替宗教。这恐怕都是对于宗教的了解限于某种层面,不知道它还有更深的关于人的意义。这些意义跟现实生活都没有关系,因为人生不管物质进步到什么程度,科学昌明到什么程度,生跟死都是过不去的一关。人生各种各样的悲剧、各种各样的苦难,是不可能用科学来消灭的。”<sup>[1]</sup>

其次是道德功能。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范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人性中有其阴暗自私的一面,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

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的具体体现。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谈到:“美国是在信仰指导下的国家,……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就是其中之一。几个月前,当我在上海见到江泽民主席的时候,我很荣幸有机会向他讲述了信仰是如何改变我的生活,以及如何改变美国的。信仰指出,在人类的法律之外还有一个道德法律,在物质之外还有更高的责任。不应该害怕宗教自由,而是应该欢迎,因为信仰让我们有了道德核心,教育我们要按照更高的标准爱戴和服务他人,并更加负责。”<sup>[2]</sup>可见美国社会的道德根基来源于美国人民的信仰。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那么这种正义感从根本上说应该来源于美国人民的宗教热情。

宗教也赋予人们对人生、世界的超越性关怀。柏杨谈到:“中国人的爱不能超过血缘,中国人的能力也不能超过血缘。一旦超过血缘,你的事业你的学问都崩溃了。因为我们没有终极的关怀。我到底是为什么,西式的话就是我到底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活着,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上帝。你可以笑他,但是他有终极的关怀。”<sup>[1]</sup>柏杨的话虽然刺耳但无疑道出了事实。四川汶川地震后,许多失去孩子的父母觉得人生已经失去意义,都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虽然他们的遭遇非常让人同情,许多责任也必须要追究,但也看出中国人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关怀。比如荷兰的商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代人运输保管的食物,以生命为代价,来守住信用。我想这是作为中国人所不可想象的事情。能做到这一点,很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商业利益、商业道德上的考虑。而是有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信仰在支撑。在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快而导致物欲横流时,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方道德文明。正如汪丁丁所说的,只有在信仰面前,金钱、权力才会化为粪土。

### 五、结语

中国社会目前的信用困境,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确实我们的传统是不鼓励人讲真话的。许多人感慨人心不古、今不如夕,也没有什么道理。另一方面,建国后我们国家又有重大历史失误,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文革时期的告密揭发之风,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只注重发展经济,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市场的拓展,交易范围的日益扩大,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造成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瓶颈。中国要摆脱目前的信用困境,需

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没有言论宗教的自由,也很难改变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也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维护社会正义,更谈不上在整个社会建立信用体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构建社会信用的中心环节和唯一切入点,是中国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很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仍然缺乏认识,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民生活水平能够提高就可以了。但是“萨斯 和三鹿奶粉事件在告诉我们,经济虽然增长了,但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来约束其负面效应,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人们无法应对。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跛脚的现代化带来的不一定是好事,也可能是更大的灾难。应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我们废除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了退休制度,我们也开始尝试村一级的直接选举。但是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病还没有根本改变,政治体制仍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两百年后,方可穿越“历史的三峡”,完全建成现代国家体

制,那么也就是说大概在 2040 年左右实现全面转型。按照这个时间表,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如何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将是我们党和政府所要面临的最重大挑战。

#### [参考文献]

- [1] 林其屏. 规则和信用: 市场经济两大基石的缺损与重构 [J]. 新华文摘, 2002 (4).
- [2] 潘岳.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N]. 深圳特区报. 2001 - 12 - 16
- [3] 石炎岭. 柏杨再谈“丑陋的中国人” [N]. 南方周末. 2008 - 04 - 30
- [4] 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的德行 [M]. 金城出版社, 2005. 1.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
- [6] 汪丁丁. 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J]. 改革, 1995 (5).
- [7] 黄仁宇. 资本主义与 21 世纪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8] [德] 马克斯·韦伯.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黄晓京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9] 茅于軾.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M]. 南大学出版社. 2003. 3.

(责任编辑: 朱德东)

## The basis of credit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WANG Xiao-gang<sup>1,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Zhengjiang 212003;

2.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operation in any society needs credit. Under modern market economy of so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the demand of credit is much higher. As it were, credit created western modern capitalism and modern market economy is credit economy. Traditional China society's credit resources are meager and can not meet the demand of modern market economy. Because of historic and current real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redit bottleneck.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must be conducted, meanwhile, other reforms must be followed so that the basis of credit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can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credit; basis; traditional culture; political system